

“中国中心观”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

王 瑞

【提要】 美国学者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观”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以往的相关探讨多将目光局限于“中国中心观”本身及附带的理论内涵等问题,探讨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实际上,如果没有国内外形势变迁催生的美国学界的“反思”潮流,以及费正清等人的大力支持等诸多因素,“中国中心观”或许不能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中心观”是为解决“冲击—反应论”的弊端而提出的,给困境中的美国中国学指明了一个前行方向。但它并非完美,有着自身的适用范围和理论缺陷。

【关键词】 中国中心观 冲击—反应论 费正清 美国中国学

1984年柯文(Paul A. Cohen)提出“中国中心观”后,在美国、中国乃至世界中国学界引起热议。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该观点提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尤其是中国学者,热情颇为高涨。^①各种角度的论证似乎使得该理论已无新意再探讨,但蹊跷的是,结果并不使人满意。如吴怀祺说:“无论是褒还是贬,或者是‘帽子满天飞’……总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似乎明白,但又不明白。”^②林同奇认为“中国中心观”“最核心”的概念之一是“移情”。^③但类似的认知,中外学者或早或迟都已提出过。对比一下,柯文似乎只是将“古今”变为“中美”,其处理的历史哲学问题都是一些陈旧的问题,从学术创新角度看,影响应该不大。

但事实上该理论影响甚广,如何理解这一现象?通过对以往学者思路的考察,笔者发现诸多学者仅将目光局限于该理论本身及附带的理论内涵等问题。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通过还原美国历史场境,考察这一理论提出的意义及相关问题,应该还有新意值得发掘。例如,“冲击—反应论”对于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作用、“中国中心观”形成的“因缘际会”、“中国中心观”的实践及其局限性以及学界的误解与误用等问题,尚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不妥之处,敬祈方家斧正。

一、“一枝独秀”:“冲击—反应论”视域下的美国中国学

“中国中心观”之所以产生重大的影响,与“冲击—反应论”在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地位有着密切的关联。它是为解决“冲击—反应论”的弊端而提出的,代表着“在正确方向上的一个进步”。^④可

① 最近的如李学智《冲击—反应模式与中国中心观——关于〈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若干问题》,《史学月刊》2010年第7期;吴怀祺:《内因与外因:柯文“中国中心观”的解析》,载朱政惠主编《海外中国学评论》第4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89—105页;肖文明《宏大叙事的探寻与中国中心观的再思考》,《学术研究》2016年第5期等。

② 吴怀祺《内因与外因:柯文“中国中心观”的解析》,第89页。

③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1—22页。

④ Paul A. Cohen, “Self-Strengthening in ‘China-Centered’ Perspectives: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Historiography”,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自强运动研讨会论文集》上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版,第70页。

以说,如果没有对“冲击—反应论”蕴含的“西方中心论”的批评和客观分析,“中国中心观”的影响力未必持久。鉴于此,我们首先要对“冲击—反应论”在美国中国学中地位的形成作一简要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纯粹美国阵营”^①得到迅速发展。以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研究中心为例,从1956年到1976年,中国研究共出版了124卷,而在1970年和1971年两年间,“几乎达到一个月出版两本书的程度”,进入了“一个硕果累累的全盛时期”。^②费正清对于出版事业的重视,使得哈佛大学的对中国研究始终在美国处于“领先地位”,^③也使哈佛大学中国研究成为美国的一面旗帜。

“冲击—反应论”则是以费正清为首的“哈佛学派”的理论根基,也是“了解美国中国学发展史的一个关键”。^④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差不多成为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⑤何以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呢?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

其一,人才机制。费正清一手创立了美国现代中国学,到了60年代,东亚中心“差不多在美国形成了一枝独秀的局面”。其培养的人才“几乎垄断了美国各主要大学的中国研究和教学”^⑥。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说,哈佛大学的对中国学研究影响力体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并且这些人才成为各地高校和其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支柱。^⑦如此看来,“哈佛学派”是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主体,影响着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发展趋势。

其二,理论范式。由于费正清等人是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创立者,且为当时处于西方学术体系边缘的中国研究建立了理论基础。^⑧故而,由其开创的研究模式、研究方法等,都会对后来者,尤其是对他们的学生产生深刻的影响。余英时说,费正清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有比较全盘的构想,因此经常向他的研究生建议具体的博士论文题目。^⑨他的学生德雷克(Fred Drake)对此深有体会地回顾,费正清面带微笑向你询问“你是不是考虑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这其实掩盖了他的真实意图,“这些看来单纯的问题,却是耗尽我们一生精力所要努力研究的,很多年以后,会出版关于某个主题的一本书,虽是弟子写的,但却是大师所构思和示范的”。^⑩

之所以会有如此现象的产生,源于中国研究处于草创阶段。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陌生领域。很多研究生经常会问“我该写什么?”费正清就会根据自己的计划加以建议。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说:“费正清手头通常会有许多有待解决的课题……但所有这些研究都是围绕一个主题写的:‘冲击—反应’……费正清期望他的学生们在他已经构思成型的研究框架中选择其中的一个题目去研究,以协助他完善他的‘冲击—反应’理论。”^⑪王晴佳也说:“大致说来,费正清的学生们接受了他的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挑战,中国响应’的观点成了一种模式。”^⑫也正因为接受了费

① 费正清:《费正清自传》,黎鸣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119页。

② 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等译,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444、437页。

③ 薛龙:《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50年史》,路克利译,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144页。

④ 朱政惠:《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以历史学为中心》,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288页。

⑤ 仇华飞:《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5页。

⑥ 费正清:《费正清自传》,第598—600页。

⑦ 龚咏梅:《孔飞力中国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6—257页。

⑧ 劳慈(Terrill E. Laut):《中国研究的再创新:新人新帽》,齐克彬译,朱政惠主编《海外中国学评论》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5—84页。

⑨ 费正清:《费正清自传》,第588、599页。

⑩ 柯文等主编《费正清的中国世界——同时代的回忆》,朱政惠等译,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114页。

⑪ 王平采访《世界的魏斐德:中国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访周锡瑞教授》,《历史教学问题》2009年第4期。

⑫ 王晴佳:《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

正清的观点,所以美国中国学的研究主题具有很大的类似性,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说:“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的中国研究以19世纪为主。”^①

如此看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中国学是以哈佛大学马首是瞻,而哈佛大学是以19世纪为主,采用的“冲击—反应论”模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学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哈佛学派”代表了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故而,针对“哈佛学派”所作的分析和批判,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也就是说,只有彻底地反思“哈佛学派”的根本问题,才能解决好美国现代中国学的问题。

二、“中国中心观”形成的“因缘际会”

如果没有发生越南战争等事件,或许美国社会的反省时代来得要晚一点,尤其是越南战争的影响,使得他们“不再轻易假设美国的威力必然是一件好事,再也不能轻易地认为是‘近代的’就必然是‘文明的’”。反映到学术上,则“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近代’历史发展道路本身问题”。^②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社会很不稳定,人们对于政府在越南所犯罪行不满,对于将西方文明强加于其他国家的做法同样不满,很多年轻人比较左翼。^③一些激进人士甚至对中国的“文革”也产生了向往之情。究其历史观,则反映了人们想突破西方模式,探索不同路径的迫切心情。^④黄宗智说,“越战”后,人们质疑现代化理论,认为其不能完全解释清楚中国近代历史的变化,而且不满“意识形态”过于严重的研究方式,呼唤真正的学术化研究。^⑤费正清也说:“此时正是我们审慎反省美国人严重的自大狂的最好时机。东亚问题研究也不例外,我们更应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这真是一个反省的时代。”^⑥所以他在1968年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发表演讲时就明确提出:“我们从西方角度提出问题,并收集证据加以回答,寻找我们所求索的东西,这样做往往有忽视中国实际情况的危险……如果我们探讨中国是为了寻找与我们的类似之处,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一个一切几乎停滞不前、‘静止’的中国,因为它没有像我们一样的变化。”^⑦很显然,费正清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但他并未形成完整的论证体系,^⑧可他又希望凝滞的学术研究得以继续发展,以实现“扩大美国人对

① 魏斐德《1963年的伦敦演讲——白乐日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影响》,齐克彬译,朱政惠主编《海外中国学评论》第3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0页。

②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前言,第43—44页。

③ 周锡瑞《哈佛的中国学研究:为帝国主义的辩护》,朱政惠主编《海外中国学评论》第4辑,第354—371页。

④ 王晴佳《中国文明有历史吗——中国史研究在西方的缘起、变化及新潮》,《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新史学讲演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7—48页。

⑤ Philip Huang, “Theory and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Modern China*, Vol. 24, No. 2 (Apr., 1998), pp. 187—188.

⑥ 费正清《费正清自传》,第319—321页。

⑦ 费正清《七十年代的任务》,朱政惠主编《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页。

⑧ 早在1954年,费正清就认识到“冲击—反应论”的局限性,他说“‘刺激’(stimulus)(或‘冲击’)与‘回应’两词不甚确切。有人可能会误解,以为我们认定先前之所以有一个‘西方冲击’仅仅是因为后来有一个我们称之为‘中国之回应’的活动。这个‘中国之回应’的活动正是我们想研究的事物,但是显然它是中国行动总体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西方冲击只是中国这个舞台中众多因素之一。把对它的回应从中国历史的总体中分解出来是十分困难的。”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中国对西方的反应》这本书的书名“更多地是一种比喻而不是科学的说法”。参见Teng and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5。亦可参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第45页注6。如此看来,费正清早已对“冲击—反应论”研究模式的弊端有所察觉,所以才会有《七十年代的任务》这篇演讲文,但没有形成完整的论述体系。

于中国的理解这个目标”。^① 所以,他对反思活动都给予了非常重要的支持。

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的成立满足了费氏的愿望。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说,由于“越战”的影响,“1967年—1968年的冬天……在我们的研究生中间普遍存在某种失落感与反感情绪,迫切要求思想解放,为此亟需一个有组织的讨论任其发泄表现。”“我应邀主持了该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和整个议程。对于他们的盛情邀请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愿意为创立组织贡献一份微薄之力,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必要的。”^②委员会成立象征着“一个发表不同意见的合法论坛,它为减少这个领域的同一性提供了希望”,也为“更广泛批评美国的对外政策、有关近代东亚的流行概念以及老一套的中国问题研究体系提供了基础”。^③王晴佳认为,该组织的成立和期刊^④的发行,代表了新一代美国中国研究队伍的形成,其特点是向“权威”挑战,最终促成了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给人一种“翻天覆地”的感觉。^⑤费正清说:“在学者委员会出版的季度《通报》(*Bulletin*)上,哈佛,特别是我本人很快便成了众矢之的。”^⑥魏斐德也说,当时的中国研究“整个领域处于分裂状态”,为学术的反思提供了契机。而《关心亚洲学者通讯》顺应了此背景,后来发表了几篇有分量的文章,矛头直指费正清和第二代学者等“权威”的著作。^⑦

这些文章中,^⑧影响较大且被费正清寄予厚望的是佩克(James Peck)的“帝国主义论”。^⑨但佩克的观点与“冲击—反应论”抑或“传统—近代论”在论证前提方面“几乎是一样的”。它们“都认定没有工业化西方的冲击——这个绝顶重要的外来震动——中国是不可能独立进行工业化的”。两者的区别是,佩克认为“西方经济势力对中国的入侵”是有害的,而对方认为是有益的。虽然表面上看,“帝国主义论”是站在上述两种取向的对立面,但由于两方论证前提“有不少共同之处”,其问题意识的出发点没有改变,评判的标准仍然掌握在西方手中,^⑩因此也没能转变“主流地位的顽固立场”,^⑪但不得不承认,佩克抓住了核心问题。

到了20世纪80年代,相关讨论还在继续,说明佩克提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美国中国学存在的“西方中心论”基调依旧是人们心目中难以释怀的困惑。1982年,费正清还在说:“我们决不应该再作过去那样的假设,认为我们能够作为中国的楷模。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所谓楷模实际上只不过是一部反面教材”,他还说自己的研究“提供给人们的不过是建立在大历史观基础上的关于中国历

① 柯文:《我的老师费正清》,《文史哲》1994年第3期。

② 费正清:《费正清自传》,第505页。

③ 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陈忠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6—317页。

④ 该委员会的期刊为《关心亚洲学者通讯》(*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⑤ 王晴佳:《中国文明有历史吗——中国史研究在西方的缘起、变化及新潮》。

⑥ 费正清:《费正清自传》,第506页。

⑦ 邹羽、徐有威:《我们这一代汉学家——魏斐德教授访谈录》,《史林》2008年第4期;罗杰·安德森:《访问魏斐德》,王平译,朱政惠主编《海外中国学评论》第4辑,第115页。按:魏氏的代际划分,与黄宗智“三代说”不同,“费正清以及其他战前人物可以算成一代。第二代在战后崛起,培养了第三代”。第二代学者正是深受“冲击—反应论”影响巨深的一代。

⑧ 与“帝国主义论”同属于70年代的还有其他著述,比如林德贝克(John M. H. Lindbeck)的《理解中国:对美国学术资料的评估》,薛光前的《一项关于中国学的评估:美国的大学和学院,1958—1975年》,但他们研讨的对象已经超出了“哈佛学派”的范围,并且总结的成果并不是针对“冲击—反应论”所产生的弊端,故本文不予讨论。参见朱政惠《关于美国中国学家的总结和反思》,《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4期。

⑨ 周锡瑞的文章重申了佩克的观点,莫尔德则是系统阐述。参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第120、158页。

⑩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第154、109、169页。

⑪ 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第319—321页。

史的零砖碎瓦”,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加倍努力研究中国”。^①这也是美国史学界的共识,1985年9月召开的美国历史学会年会的“主题是回顾和展望美国职业历史学界一百年来的成就和不足……会场内外,到处都在谈论美国历史研究的毛病和问题”^②。而80年代相关反思性的文章“要比以往得多”。不乏名家如黄宗智、刘广京等人。问题是,为什么柯文的著作“影响最大”^③?归其原因,主要是缘于柯文总结出“中国中心观”。而其他一些方案在解决“哈佛学派”理论弊端的方面,与柯文相比存在不足。以黄宗智的《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和刘广京的《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趋势》为例,两篇文章都属于在中国所作的学术报告。与柯文著作相比,两篇文章都很注意与中国学术传统及相关华裔学者的联系。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其言说对象一个是中国大陆学者,一个是美国同行。^④可问题是,即使柯著面对的是美国同行,可他为什么要淡化华裔学者的成就呢?这与“冲击—反应论”弊端的承载者——美国本土学者^⑤是受“冲击—反应论”影响巨深的战后崛起的一代有关,而这一代占据着美国中国学的主流地位。虽然张仲礼、何炳棣、萧公权、瞿同祖等华裔学者甚至开辟了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一些新领域,^⑥但该阶段“绝大部分学术研究”都是按照“冲击—反应论”模式处理的。^⑦

正因如此,柯文著述在分析对象方面存在着“选择性较强”的特点,比较“侧重19世纪。因为这个时期对于书中要考察的两个理论模式——冲击—回应与传统—近代模式——是极为关键的。本书在所涉及的学术著作与所讨论的题目或问题时,也是有选择性的”。^⑧这也是屡遭学界批评的地方,如埃文斯(Paul M. Evans)说:“《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引起了众多的争议,其中之一就是柯文对于作者的选择问题。”^⑨但如果了解了以费正清为首的哈佛学派在美国的地位,相信所谓柯文选择的时间问题、作者问题,都不难以理解。所以柯文才会说:“我写此书之初,心目中的读者主要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中国学家。”^⑩确切地说是美国本土中国学家,正因如此,柯文回应批评时还在坚持说:“我不认为我的基本论点需要修改,美国中国学家将冲击—反应论更多地用在19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上,传统—近代论则是贯穿19、20世纪。”^⑪也正因为“选择性较强”,柯文的反思和总结才会切中时弊。所以柯文说用“中国中心观”理解中国比“冲击—反应论”和“传统—近代论”更为深入,代表着美国历史编撰学的进步。^⑫这对于充满“悲观气氛”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史学界可谓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下引起诸多的反响。

① 费正清:《费正清自传》,第580、550、584页。

② 王希、姚平主编:《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0—151页。

③ 朱政惠:《关于美国中国学家的总结和反思》。

④ 熊月之:《研究模式移用与学术自我主张》,《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5期。

⑤ 主要是指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们的问题意识来源于美国学术环境。

⑥ 吴原元:《走进他者的汉学世界——美国的中国研究及其学术史探研》,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7—220页。

⑦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序言,第54—55页。

⑧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前言,第46—47页。

⑨ Paul M. Evans, “Review Works: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a Past* By Paul A. Cohen”, *Pacific Affairs*, Vol. 58, No. 1 (Spring, 1985), pp. 130 - 131. 张朋园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柯教授没有提及在美国的华裔学者所扮演的角色。”参见张朋园《柯著: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

⑩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中文版前言,第1页。

⑪ Paul A. Cohen, “Our Proper Concerns as Historians of China: A Reply to Michael Gasster,” *The American Asian Review*, Vol. 6, No. 1 (Spring 1988), pp. 1 - 33.

⑫ Paul A. Cohen, “Self-strengthening in ‘China-Centered’ Perspectives: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p. 70.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柯文能够做到?他的学术研究有什么特点?

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曾对柯文有过评述,他说:“柯文确切地掌握了历史学和一些很困难领域的学术研究手段。他也始终注意关心一些总的问题,并很注意在必要的时候运用比较的方法。他的思路清晰,观察问题立意很高。他的所有这些素质可以见诸其著作,并且也将继续见诸其未来著作。”^①这是在柯文博士毕业四年后史华慈的评语,说明此时柯文已经具备了研究“很困难领域”的能力。林同奇说,这种能力的获得“是缘于史华慈的潜移默化”。^②柯文虽未完全赞同林氏的观点,指出在本科阶段就已经“接触到了后来史华慈又加以强化与深化的若干观念”。但他还是“非常乐于承认史华慈教授在范围广泛的许多问题上对我的作用或影响(而且在我看来,这些问题都是最为重要的问题),诸如我们应该如何去思考过去,如何去提出历史问题以及如何才能察见那种在初看上去使人失去警惕的、貌似简单的现象下面隐藏着的复杂性”。^③这是一种“独特的路径”,其核心要点是“对于已为人们接受的真理、以预测为中心的解釋模型、日常学术话语中的陈词滥调,无论以哪一种形式出现的还原主义都持有健康的怀疑态度……对人们以为是不证自明的内容进行重新界定,解释并打开隐藏在简单标签背后的复杂性”。^④林同奇说正是凭借于此,“柯文后来得以走出他所谓的现代史学的‘单纯天真’,强调历史知识的复杂性。”^⑤

比如在王韬研究中,柯文就注意到一些“日常学术话语中的陈词滥调”,他说,“传统”与“现代”“这类两极对立的概念实在太僵死……当我们把诸如‘传统’和‘现代’之类思想强加在一个人的思想(或者强加在任何历史现象)上时,我们的目的是想从众多资料所呈现的混乱状态中产生出秩序和清晰来。但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却时常会忽视了为此而付出的过分简单化和歪曲(当初经验)的代价。”^⑥而对“冲击—反应论”的反思以及对“中国中心观”的总结,也正是得益于柯文学术的“独特的路径”才可以实现。

三、“中国中心观”的适用范围及学界的误解与误用

概括地说,“冲击—反应论”抑或“传统—近代论”认为,古代中国是一个“停滞、静止、消极”的“传统社会”,近代中国发生的“任何重要变化只可能是由西方冲击造成的变化,或者是对它的回应所导致的变化”。^⑦芮玛丽(Mary Clalaugh Wright)的“同治中兴”研究就是秉持着此类观点,视中国传统缺乏活力。她说:“中兴失败的原因是现代化的要求与儒家社会追求稳定的要求水火不容。”^⑧

而“中国中心观”在理解19、20世纪中国历史时,“不仅把此段历史视为外部势力的产物,而且也

① 哈佛档案馆文件,档案类:ACC#14133,BOX3。转引自朱政惠《柯文教授的清史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② 林同奇:《现代史学与后现代史学之间或之外?——从〈历史三调〉谈柯文史学思想的定位问题》,《二十一世纪》2005年2月号。

③ 柯文:《史学研究的标签暴政》,《二十一世纪》2005年2月号。柯文本科就读于芝加哥大学,该校以“理论研究”和“独立思考”见长,其学风异于其他高校,且非常重视研究工作,将基础研究视为大学的“首要任务”。参见钱存训《留美杂忆——六十年来美国生活的回顾》,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43页;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6页。

④ 柯文、梅谷、麦克法库尔《怀念史华慈》,《世界汉学》2003年第1期。

⑤ 林同奇:《现代史学与后现代史学之间或之外?——从〈历史三调〉谈柯文史学思想的定位问题》。

⑥ 柯文:《史学研究的标签暴政》。

⑦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第168—169页。

⑧ 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房德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应视之为帝制时代最后数百年出现的内部演变的产物”由此对芮玛丽之类的观点提出了挑战。^①例如,魏斐德的《中华帝制的衰落》(1975年)一书,除探讨与西方有联系的如鸦片战争、维新运动等历史问题外,还用相当长的篇幅分析了“19世纪早期,在西方势力入侵中国之前,中国内部发生的深刻的、重大的变化”,^②如绅士制度、人口变化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一个长期、动态的内部发展”,并“对19世纪中国抗击西方和日本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③这就反驳了“冲击—反应论”视中国“内部不能变革……只能依靠外力革命的推动”这一解释模型,也说明造成中华帝制的衰落这一重大历史现象并非“冲击—反应论”所能全部涵盖。

不仅如此,一些传统因素在现代中国的作用,不仅与西方的“冲击”毫无联系,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甚至长期以来不被西方学者所知晓。例如,柯文的《历史的言说:越王勾践故事在20世纪的中国》^④一书探讨的就是此类问题。柯文说:“我研究了中国五十多年,但我还不知道勾践的故事。”^⑤在看到卧薪尝胆图片时,柯文和他的朋友(西方人)甚至将勾践误会成一位“鸦片瘾君子”和读书的人,但他的中国朋友却能立即给出正确答案。^⑥就是此类具有“内生知识(insider cultural knowledge)”^⑦性故事却与20世纪中国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如抗日战争、经济建设等)发生了联系。

“中国中心观”提出后,对于解决美国中国学存在的弊端问题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但它“更加关注内部过程和动力”^⑧注重“内在历史”^⑨对于中国的影响,使得一些学者在理解这一问题上出现了误会。例如,李学智说,“中国中心观”是“欲以中国有与西方影响无关的悠久的改革传统,来弱化乃至否认近代中国历史与西方冲击的联系”^⑩。罗志田指出,“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是“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不可回避的一大主题”,不应该以为它“可以功成身退”,他由此对“中国中心观”提出质疑。^⑪张仲民则认为,“近代中国社会踏上了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的不归路”,很多现象都“决不是用单纯的‘中国中心观’……可以解释的”。^⑫甚至被柯文誉为“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也提出了质疑。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说,自己“不认同这个身份,因为他从不认为只有一个中心。”^⑬周锡瑞也认为:“‘中国中心观’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它过分强调中国发展所有动力皆来自中国内部,它与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西方的入侵才导致了发展的论调是两个极端。”^⑭这些观点的核心是说,在研究近代中国历史时,“中国中心观”弱化或者忽略了“西方”的作用,而过分强调内部发展因素。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中国中心观”的特征以及柯文的相关言论,就会发现,一系列问题并非

①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中文版前言,第3页。

② 安德森:《访问魏斐德教授》,第116页。

③ 魏斐德:《中华帝制的衰落》,邓军译,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1—3页。

④ Paul A. Cohen, *Speaking to History: 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⑤ 张冠梓主编:《哈佛看中国》(文化与学术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2页。

⑥ Paul A. Cohen, *Speaking to History: 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pp. 58-59.

⑦ Paul A. Cohen, *Speaking to History: 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preface, pp. XIX-XX.

⑧ Paul A. Cohen, “Self-Strengthening in ‘China-Centered’ Perspectives: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p. 70.

⑨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第210页。

⑩ 李学智:《冲击—回应模式与中国中心观——关于〈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若干问题》,《史学月刊》2010年第7期。

⑪ 罗志田:《从西学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

⑫ 张仲民:《一个思考:由柯文“中国中心观”谈起》,《人文杂志》2003年第5期。

⑬ 龚咏梅:《孔飞力中国学研究》,第290页。

⑭ 王平采访:《世界的魏斐德:中国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访周锡瑞教授》。

如论者所述。柯文曾解释道：“这个新的取向，不是说西方对中国近代史不重要，主要是认为过去美国史学界的研究取向，一方面太注重美国及西方从外部对中国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不承认中国自身内部也有很重要的变化，这是应该承认的”因此他感慨地说，“有些人是误会了我的观点，以为我的取向是强调外在因素根本不重要，这不是我的意思”。^①柯文主张的是：“我们可以做到较多地从中国内部出发，较少地采用西方中心观点来研究中国近世史。换言之，我们至少可以把这段中国历史的起点放在中国，而不是放在西方。”^②他认为，“中国历史既有它自身内部发展的一面，又有外部作用对它的影响的一面，而起决定作用的，是内部的因素及其变化。”汪熙曾提出，“任何外来冲击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只有通过中国内部因素才能起作用。中国社会内部自有其运动的规律，它必然会向前运动发展，并且最终决定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与结果。”对此观点，柯文表示赞同。^③

由此看来，“中国中心观”并没有忽视西方的影响，也不是要“取代”“冲击—反应论”，它只是试图更加全面地理解近代中国的“变化”以及西方在此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④

虽然柯文并未忽视“西方”的作用，但他希望美国史家“摆脱欧洲或西方中心先入为主的假设”，“移情”到“中国人的世界”并“根据中国人自己的经验而非西方人的想法去重构中国历史”。^⑤对此主张，一些学者提出了质疑。例如，林同奇认为：“他（柯文）朴素地假定有一个独立于史家个人意识之外的过去，而且认为尽量寻回这个过去是史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另一方面，柯文又支持关于历史真理的相对主义观点，认为这个过去最终是无法探知的。”^⑥王晴佳指出，“中国中心观”虽然“想突破西方中心论，扬弃近代化理论，但吊诡的是，他们把中国革命视为别样近代化的实践，因此还是无法真正地走出近代化理论的藩篱，还是把近代化视为世界历史的必经之路。”^⑦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曾经说过：“历史认识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确定一种文化的人对另一种文化的人的理解可以有多深，用一种文化的概念系统去转译另一种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保证叙述历史者不给出与亲历历史者不同的意义。”^⑧柯文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说，由于史学家“局外者”的身份，不可能完全消除种族主义歪曲，他只是希望历史学家能够意识到这种歪曲，并把“歪曲减到最低限度，把自己解脱出来，从一种西方中心色彩较少的新角度来对待中国历史，因为要做到这点却是可能的。”^⑨所以柯文对史学家在研究中“概念”的使用有警觉，他认为“作为历史学家，应该尽可能地还原真实的历史。与此同时，在企图使得历史容易理解和有意义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使用一些概念或者创造一些概念，因为这些概念指挥（ordering）的特质，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歪曲。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的任务是选择概念，而这个概念应尽可能降低歪曲的程度，扩大解释的力量。”^⑩柯文对“理论”和“策略”的使用也有警觉，他说：“主要在运用这些理论和策略的时候，要对其

① 西村成雄《“中国中心观”倡导者柯文教授访谈录》，徐培华译，《近代中国》1996年第6期。

②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第17页。

③ 西村成雄《“中国中心观”倡导者柯文教授访谈录》；汪熙《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取向问题——外因、内因或内外因结合》，《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

④ 柯文从没有说过“冲击—反应论”不能运用中国研究，他只是将其限制了一个使用范围。参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第42页。

⑤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第247页。

⑥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译者代序，第29—30页。

⑦ 王晴佳《中国文明有历史吗——中国史研究在西方的缘起、变化及新潮》。

⑧ 雷蒙·阿隆《论治史：法兰西学院课程》，冯学俊等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15页。

⑨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第53页。

⑩ Paul A. Cohen, “Our Proper Concerns as Historians of China: A Reply to Michael Gasster”, pp. 1–33.

地区偏见(特别是西方中心论)有足够的敏感度,也就是说要注意适应度。”^①可见,柯文是想通过“中国中心观”提醒美国史家在运用“西方经验”的时候,注意其在中国的“适应度”。由于对“适应度”问题的重视不够,后来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如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那本讨论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的著作《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柯文批评道:“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概念与西方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我认为它作为分析工具用来探讨中国历史是不合适的。当美国人写中国历史,不得不用英语词汇和概念描述我们的发现时,就有产生潜在歪曲的可能。但是我们在选择词汇和概念时,可以对歪曲的程度进行一定的控制。依我的观点,自由主义并不是一个恰当的选择……我担心的是,通过在中国历史上寻找一些现象如自由主义——这种现象在我们历史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并充斥着价值观和强烈的感情色彩——我们冒着非常大的风险去刻画中国历史,实际上这并不是真正属于中国历史。”^②

随着学术的发展,“中国中心观”的局限性也逐渐地显现出来,也就是它的适用范围问题。这其实涉及如何正确理解“中国中心观”的问题。柯文说过,“中国中心观”“更多地只是一组趋向,而不是某种单一的、界限分明的取向(尽管为了方便起见我仍称之为取向)。”他还说:“1970年以来,在美国采用内部取向研究帝制晚期和帝制以后中国的潮流已日益壮大,但至今还无人肯下点功夫对这种取向做出描绘。”^③“我所做的不过是明确地提出一套其他研究者已经开始使用的研究方法,我认为这套研究方法对中国的中国研究来说是恰当和有益的。”^④由此看来,柯文是“确认”一种新的历史写作模式,并将其命名为“中国中心观”。^⑤客观地讲,在《在中国发现历史》前,柯文并没有一本“中国中心观”方面的著作,很多学者在个别问题研究方面要远超柯文,如孔飞力的代表作《帝制晚期中国叛乱及其敌人》(1970年)被认为是“标志着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一项重要突破”。^⑥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没有提出这种取向,很多思想都是零零散散,直到柯文,这些思想才获得有意识的检讨。所以在此意义上,柯文在“中国中心观”上的成就表现在其汇集了以往散落的思想,并将其系统化,并明确提出“中国中心观”应该为美国中国学前进的方向。^⑦

由于只是“取向”,所以柯文“故意不用强烈色彩的词汇‘范式’来描述它们”而用的是“开放的,而不是排他的独断的词汇”。^⑧鉴于此,柯文说,虽然“用中国中心观方法更加关注内部过程和动力确实代表着在正确方向上的一个进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中心观方法就是完美的,不需要提高和改进了。我确定,从现在开始的十年时间里,一定会有人站在会议上,指出中国中心观方法的弊

① Paul A. Cohen, “Introduction to the 2010 Reissue: 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e China-Centered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y”, i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x - lxxv.

② Paul A. Cohen, “A Reply to Professor Wm. Theodore de Bar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35, No. 4 (Oct. 1985), pp. 413 - 417.

③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第170页。描绘这种新趋势的还有他人,但与柯文的描绘有差异,参见同书,第213页注3; Paul A. Cohen, “Sinological Shadowboxing: Myers and Metzger on the State of Modern China Studies”, *Republican China*, Vol. 9, No. 1, 1983, pp. 5 - 10.

④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第260页。

⑤ Paul A. Cohen, “Introduction to the 2010 Reissue: 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e China-Centered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y”, pp. x - lxxv.

⑥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第195页。

⑦ 如同刘知己、章学诚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一样,参见《余英时文集》第1卷《史学、史家与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

⑧ Paul A. Cohen, “‘State’ Domination of the China Field: Reality or Fantasy? A Reply to Marks”, *Modern China*, Vol. 11, No. 4 (Oct. 1985), pp. 510 - 518.

端和不足 就像我现在指出冲击—反应论和现代化理论缺陷一样。”^①

柯文的认知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中国中心观”不是一个固定、严格的理论,只是一组取向,并且这组取向是可以增益的,它更多地是关注20世纪70年代美国中国学发展新概况,因此“中国中心观”难免存在着缺陷;其二,“中国中心观”不是柯文的发明,只是柯文的总结和提炼。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中美学术交流正常化,美国中国学出现了新的繁荣,很多研究主题反映了“中国中心观”的局限性。实际上,柯文在总结“中国中心观”第二个特征(即“横向”分解法)时就说过:“这种取向并不是以中国为中心,而是以区域、省份或是地方为中心”。^②后来柯文在《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③一书的序言中,对此有更详细的分析和论证。如王国斌的《转变中的中国》、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两书,他认为他们的“学术研究主要关心的是世界历史,称之为‘中国中心’的研究取向似乎是很不恰当的”。甚至连柯文自己的研究也超过“中国中心观”的范围,他说《历史三调》“主要目的不是要讲中国历史,而是从更宽阔的角度探讨历史写作的一般性问题,而这个目的并不与‘中国中心观’有关。”对于非汉族群体^④以及海外移民,柯文说:“如果中国中心的研究取向并不是处理中国境内的非汉族社群的观点和经验的最佳分析工具,它也不一定适合于研究那些已经移居海外的华人。”这样看来,“中国中心观”只能处理中国境内单一民族——汉族的问题,并且研究目的必须是有关中国历史的。所以柯文明确地说道:“在某些例子里,可能需要放弃这种研究取向,但在更多情况下,其实需要和其他的研究取向互为配合。”^⑤

“中国中心观”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很多学者对柯文的思想进行了解读,如西方中心论、历史相对主义、局外视角、移情,等等。实际上,这些解读并不仅属于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柯文研究主要探讨的是“历史学家的角度”,^⑥他更多地借助于前贤在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上的一些成果来帮助自己分析研究,只不过他是从实践的角度出发的。如此看来,“中国中心观”具备了个性和共性两个特性,无论是对于美国中国学还是对于史学理论,都有参考价值。这也是此书在中国学界影响力持久的重要原因。

(作者王瑞,南阳师范学院文史学院讲师;邮编:473061)

(责任编辑:景德祥)

(责任校对:李桂芝)

① Paul A. Cohen, “Self-Strengthening in ‘China - Centered’ Perspectives: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p. 70.

②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第178页。

③ Paul A. Cohen, *China Unbound: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 Routledge Curzon, 2003.

④ 龚咏梅说,柯文的“中国中心观”的隐含意思明显带有“中原中心观”、“汉族中心观”,因为非汉族民族被排除在“中国”之外。参见龚咏梅《孔飞力中国学研究》,第290页。

⑤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第261页。

⑥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第227页。

Back to State Building: An Analysis of the Qing Imperial Policy and the Study of New Qing History
//Liu Wenpeng

Having applied imperialism theories in studying Qing history, Peter Perdue and other scholars of the “New Qing History” School put forth the notion of “Manchu imperialism” to describe the Qing dynasty’s policy toward Inner Asia, which has become one of the theoretical origins of the School. These historians believe that the Qing empire’s expansion into Inner Asia during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was comparable to the colonialist policies of the Ottoman and European empires. However, having built 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Western colonialism and imperialism, this viewpoint carries an ideological overtone and contains serious logical and historical flaws. We need to criticize it and study the Qing once ag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 building. We should not be misguided by erroneous theories; instead we should adopt a comprehensive and historical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Qing political history diachronic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cheology and Historiography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1911 – 49): A Case Study of Xia Nai’s (1910 – 85) Early Career *//Wang Xing*

Based on the reading of Xia Nai’s diary as well as readings of other relevant sourc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by looking at Xia’s early career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At first, Xia Nai regarded archaeology as an inferior form of scholarship. But later he changed his mind and believed instead that archaeology was key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ancient China. This reversal of mind in Xia Nai reflected his early academic experience. It was also related to the overall academic atmosphere in the Republican era. With respect to the study of prehistorical and historical periods,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obviously play a different role. However,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s essential to the study of archaeology too. Indeed, while their approaches are different,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both seek to understand and reconstruct the ancient past. Studying Xia Nai’s attitudes toward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helps us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holarship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It also improves our knowledge of how the two disciplines developed further during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period.

Yan Zonglin (1904 – 1978) and French Sinology *//Zhang Wei*

As a prominent historian in modern China, Yan Zonglin is well known for his broad knowledge. Yet it is in the field of the history of Sino-European relations that he made the most notable achievement. This achievement was related to Yan’s study in France where he developed a keen interest in French sinology. Indeed, thanks to his French education and his proficiency in the language, Yan was well prepared for making academic exchanges with French sinologists. With respect to subjects of study, research methods and source materials, his early writings in the study of Sino-European relations reflect his solid training as well as the mainstream interest in French sinology of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His publications also became well received among French sinologists. Having acquainted himself well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French sinology, Yan made a unique scholarly contribution, one that demonstrates a cross-cultural characteristic. His career and accomplishment are truly exemplary.

“China-centered Approach” and the China Studies in the U. S. *//Wang Rui*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the “China-centered approach” advocated and advanced by Paul A. Cohen has exerte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Yet previous studies tend to only focus on the approach itself and its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s such, they have not yielded very satisfactory result. In fact, the author contends, the rise of this “China-centered approach” needs to be examined in a much larger context. Indeed, if there was not a general trend of critical reflection of academic studies in the U. S. and John K. Fairbank’s support, Paul Cohen and his associates might not be able to put forth their theory. At least, the “China-centered approach” might not have had such a considerable influence. While it helped modify the previous “challenge and response approach” and pointed to a new direction of China studies in the U. S., the theory itself was far from perfect. It has its theoretical weaknesses as well as some limits in application.